DOI:10.13539/j.cnki.11-5475/f.2026.03.015

中美博弈背景下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中美博弈背景下，韩国对外投资战略转向“安全驱动”，通过对美加大投资、在东南亚多元布局以及聚焦高端技术产业，在政治同盟与经济利益间寻求平衡，以提升供应链韧性与战略自主性。

文/李天国 编辑/孙艳芳

中美博弈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大结构性变量。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出口管制与资本审查相继升级，美国通过“脱钩”与“去风险化”政策，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秩序。但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体量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仍保持着对周边国家和全球跨国公司的强大吸引力。这种博弈态势使得全球投资流向出现分化与重构，第三方国家企业在海外投资布局中往往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成本”。

韩国是受中美博弈影响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韩国在安全与防务领域与美国紧密绑定；但在经济上，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重要投资目的地。韩国的三星、LG、现代等跨国公司均在中国深度布局，从制造到研发形成完整产业链。这种双重依赖使得韩国在战略选择上格外敏感。一方面，美国要求其在技术安全与产业链重构上更多地“选边站”；另一方面，中国对韩国投资开放程度与市场潜力仍然不可或缺。

基于这一背景，韩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定位：既要保障国家安全与盟友合作的政治需求，又要维护企业全球竞争力与经济利益。如何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如何通过多元化与产业升级提升长期韧性，成为韩国学界与政策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中美博弈背景下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结构变迁

第一，从投资动机上看，呈现出显著的“安全驱动型”投资特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带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型”投资特点。经过20多年的海外投资实践后，韩国跨国公司开始向东南亚设立生产工厂，投资规模也开始迅速扩大。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也逐步转向“市场寻求型”。进入21世纪后，韩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投资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是全球新冠疫情结束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高筑，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转向“安全驱动型”。目前韩国海外公司的销售额中，当地销售比重上升，而出口第三国的比重下降，呈现出“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销售”模式。由于美国设置严格的贸易壁垒和原产地规则，韩国企业选择将工厂迁至美国，以获得市场准入资格。这种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质。同时，韩国企业通过在美建立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意在嵌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技术联盟，防止在未来技术标准制定中被边缘化。韩国已成为全球第十大对外投资来源地，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达到474亿美元。

第二，从投资区位选择来看，韩国正向全球布局多个“替代性生产基地”。2020年后韩国对外投资在地域上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见图1）。一方面，韩国持续加大对美投资，尤其是半导体、汽车、电池等高端制造业。韩国对美投资占比从2018年的21%激增至2024年的34%；另一方面，韩国对华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对华投资占比从2018年的9.3%下降至2024年的2.9%，但存量方面依然较高。此外，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逐渐成为韩国在东盟的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象，2024年韩国对三国投资占对东盟投资总额的81.20%。其中，越南表现最为稳定，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占比多年占据30%以上的份额，2018年甚至达到49.3%，是韩国企业在东盟制造业基地中最核心的国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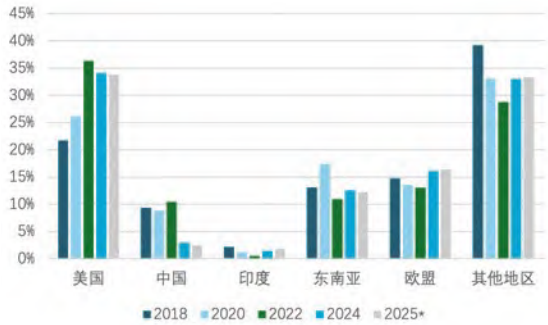

图1 韩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数据进行整理
注：2025年为上半年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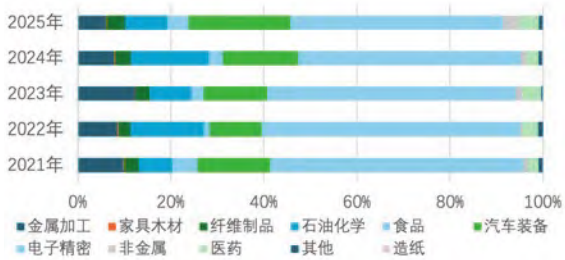

图2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细分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数据进行整理
注：2025年为上半年数据。

家。这既是韩国的“中国+1”战略的体现，也是对美国出口管制的规避。

在越南，韩国企业既可享受《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优惠关税，又能适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规则。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与商业枢纽，也吸引了韩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且其占比保持稳定。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受韩国企业青睐的新兴投资市场。2018年韩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8亿美元，但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以22.8亿美元超越新加坡和越南，一度成为最大的韩国企业投资目的地。韩国企业通过多个生产基地、多元化合作伙伴和跨区域资源配置来避免被单一市场或规则体系锁定。

第三，投资产业重心向技术密集型战略产业跃迁。从产业层面来看，随着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从传统的纺织、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技术密集型战略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是“BBC”产业（Battery—电池，Biology—生物，Chip—半导体）。以三星电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投资的晶圆厂、LG集团子公司（LG Energy Solution）与SK集团子公司（SK On）在北美各地与通用、福特等汽车企业合资成立的动力电池工厂为代表，这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绿地投资项目，构成了韩国新一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这表明，韩国的投资意图已不再是寻找低成本生产基地，而是为了控制核心技术的产业链。

从图2可以看出，电子精密制造业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行业，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远高于其他行业，2025年达到38.1%。其次为汽车装备制造业，2025年该行业的比重达到18.1%。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中，波动最大的是石油化学，2022年上升至14.2%，2025年又回落至7.6%。需要指出的是，自2010年以来，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将海外并购作为保障关键产业链的重要手段，推动高频、高额与精准投资。过去10年，两家公司完成的近20起重大交易几乎全部指向海外，多数为美国和欧洲的高新技术企业，单笔收购金额最高达到80亿美元，堪称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史上最激进的10年。

韩国企业海外并购表现出极强的“技术饥饿症”。他们并购的目的不是扩大产能或抢占市场，而是直接买下前沿技术、核心专利和顶尖团队。无论是三星电子收购以色列相机技术公司Corephotonics、美国微显示制造商eMagin，还是LG电子收购以色列网络安全服务商Cybellum，本质都是为了快速集聚技术与产能，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链生态。

美国介入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影响

中美博弈已深刻影响全球投资布局。作为高度依赖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型经济体，韩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美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影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实施诱导性产业政策。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打破了过去数十年崇尚的新自由主义不干预原则。这些法案不仅提供巨额补贴吸引三星电子、SK海力士、现代汽车等韩国半导体与新能源电池巨头赴美投资，更关键的是设定了严苛的“护栏条款”。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人为改变边际投资收益率的手段，迫使韩国企业在接受补贴的同时，必须承诺限制其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中国的先进制程扩产。这实际上是对韩国资本流向实施了“排他性锁定”。

第二，通过长臂管辖与出口管制对韩国企业进行约束。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对华投资设限，并要求韩国配合。通过修订《出口管理条例》，美国实际上掌握了韩国企业技术升级的“闸门”。由于韩国核心技术与设备依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将本国政策内化为韩国企业的合规成本。这种介入使得韩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被迫将政治风险作为首要变量，而非单纯的成本效率考量。

第三，通过关税谈判重构供应链，让韩国企业不得不权衡效率与安全。根据2025年美国与韩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将商品关税从25%降至15%，但条件是韩国承诺向美国进行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的投资。美国以市场准入为条件介入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深刻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运行逻辑。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市场、效率或战略资产。然而，美国的强力介入迫使韩国企业从“效率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这种转变导致了明显的贸易与投资转移效应。韩国企业被迫重置其全球供应链，将新增产能从成本更低、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转移至成本更高、政治风险可控的美国及其盟友。从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政治逻辑凌驾于比较优势之上，无疑会导致短期内福利损失和生产成本上升，打破了既有的最优分工模式。

对韩国经济而言，美国的介入带来了一场严峻的压力测试。一方面，韩国面临巨大沉没成本与机会成本。韩国半导体产业在华拥有庞大存量投资，美国的限制措施使这些资产面临技术迭代停滞甚至“搁浅”的风险。同时，放弃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半导体消费市场的增量份额，对韩国企业构成了高昂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韩国陷入非对称依赖困境。虽然赴美投资能获得技术外溢和市场准入，但高度受制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韩国企业在美国的产能，面临劳动力成本高昂、供应链配套不足等问题，导致运营效率下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韩国会丧失其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性，其宏观经济波动将更紧密地与美国经济周期及政策捆绑。

面对美国的强势介入，韩国需要在维系美韩同盟的安全红利与承受供应链割裂的经济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而这种平衡的脆弱性将是其经济长期面临的最大系统性风险。

当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与具体路径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韩国政府研究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其主要内容为以下三个目标。一是提升国家经济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的整体韧性。这一目标意味着在全球供应链受冲击时，韩国能够通过多元化布局保持产业与市场的稳定。韩国正推动从单一电子与半导体依赖转向新能源、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等多元化投资。二是维护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提升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战略自主性。美国作为盟友的介入虽有助于短期技术获取与安全合作，但其政策往往优先服务美国利益。当国际局势变动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时，美国可能通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或联盟压力等方式限制韩国获取核心技术。这一目标体现了从依赖向自主转型的考量，最终目标是通过技术自立实现国家安全的坚实保障与核心利益的最大化。三是持续提升韩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与国际经贸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国家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程度。韩国政府希望通过深度参与规则谈判与制定过程，巩固韩国在高附加值环节的优势，使其成为全球供应链中难以绕开的节点，从而增强经济韧性与战略安全。为实现以上战略目标，韩国采取了以下具体政策与路径。

第一，向新兴领域倾斜资源，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在数字经济方面，韩国依托其信息通信技术优势，重点推动人工智能（AI）、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的投资。例如，韩国电信公司KT与微软签署为期5年战略协议，共同成立创新中心，开发云服务和AI服务。在东南亚，韩国企业利用其数字技术优势，拓展移动支付和智慧城市项目。在绿色投资方面，韩国提出“绿色新政”，鼓励企业将新能源、氢能等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LG新能源和现代汽车在北美的电动车电池和氢能设施投资即为典型案例。同时，韩国企业也在东南亚积极参与太阳能、风能项目，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

第二，围绕关键产业领域，加快形成自主可控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技术体系和产业链配套能力。2022年生效的《关于加强与保护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竞争力的特别措施法》及后续的《国家前沿战略产业培育与保护基本计划》构成了这一政策的制度框架。这些规划以“实现前沿战略性产业强国与强健经济安全”为愿景，重点研发半导体、动力电池、显示技术、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19项国家尖端战略技术，计划到2027年对尖端战略产业企业投资达到550万亿韩元。这些规划强调本土化研发、供应链闭环构建与人才储备，旨在降低外部技术转移的不确定性，确保核心技术产业链的可控性。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贸规则的制定与修订。自2022年RCEP生效以来，韩国通过深度参与RCEP联委会，推动原产地规则累积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的优化。同时，韩国于2024年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成为首个非创始成员国。通过加入该协定，韩国把既有的数字治理经验和产业优势转化为可外溢的规则要素，增强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制度影响力和谈判能力。韩国已与中国、美国、欧盟等三大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与59个国家（地区）签署并生效了22个自由贸易协定。2025年，韩国完成了韩国—英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大幅放宽了汽车等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增加了AI、数字贸易规则、供应链韧性及投资者保护等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相关内容。同时，韩国也启动关于加入CPTPP的审议议程，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通过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知识产权和新型服务业等领域参与规则制定，韩国在巩固自身在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领域优势的同时，提升其作为参与规则制定者的议价能力。

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美国通过强力产业政策重塑全球供应链并迫使韩国企业调整供应链的态势，中国应保持“以我为主”的战略定力，通过强化市场逻辑来对冲政治风险，加强同周边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

第一，通过差异化产业发展战略加快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去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减弱，产业格局加速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要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链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重点突破与自主可控”策略，集中资源支持关键领域发展，加大国产化替代力度，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链，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找出易受冲击环节，设计替代路径，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保持战略主动。

第二，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所形成的强大“磁吸效应”，吸引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美国虽可通过巨额补贴扭曲供给侧成本结构，但难以在短期内复制中国的多层次应用场景与消费需求。这种需求端的不可替代性，正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最坚实的护城河。要对标DEPA、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通过《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中西部等地区，并给予税收、用地等政策优惠。

第三，进一步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是巩固区域产业链稳定的战略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路径。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将中韩经贸合作的重心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拓展。可设立中韩产业合作基金，支持跨国联合研发中心建设，聚焦6G、AI、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技术共享与标准共制。在区域合作层面，积极推动RCEP规则的落地实施，特别是利用原产地累积规则，深化中韩两国在东盟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内寻找中韩利益契合点，对冲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的影响。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重点学科“一带一路”〔DF2023ZD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18ZDA129〕）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新兴经济体研究室执行主任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